

蘇聯 哲學 問題

在西方哲學史上討論社會上的發言

日 丹 諾 夫 著
立 三 譯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日丹諾夫 著
立 三 譯

蘇聯哲學問題

在『西方哲學史』討論會上的發言

山東新華書店出版

一九四八年四月

目錄

編者前記

日丹諾夫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在詩論亞歷山大洛夫『西歐哲學』

史一書討論會上的發言

一 論亞歷山大洛夫所著教科書中的缺點

二 論我國哲學戰線的狀況

附錄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

與羣衆連系是黨的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

論忠誠與老實

藍列波巨作
亞天貳譯 (三〇)

斯列波夫作
蘇瑛譯 (三六)

A·葛萊普涅夫作
齊生譯 (四二)

斯列波夫作
齊生譯 (四八—五三)

(一)

(二)

(一九)

編者前記

今年六月間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曾主辦一盛大的哲學討論會，大洛夫同志所著『西歐哲學史』一書，當時，聯共黨中央各委員，斯大林同志，及全國著名哲學家百餘人濟濟一堂，會展開熱烈爭論。六月二十日，聯共中央書記之一日丹諾夫同志作了近乎總結性的發言，全面地深刻地檢討了亞氏一書的缺點，且向蘇聯的哲學家提出了偉大的歷史性任務。這裏刊印的就是日丹諾夫同志發言的全文。

日丹諾夫同志在其發言的第一部份中，詳細批判了亞歷山大洛夫同志所著教科書的缺點，這些缺點，總起來說，就是：（一）對哲學史的研究對象沒有明確而概括性的規定，而所給予的部份的規定也是不正確的；（二）對馬克思主義的產生過程、馬克思主義出現的歷史意義、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黨性與戰鬥性等問題，犯了原則性的錯誤、歪曲與模糊不清；（三）在哲學史的敘述上及對舊的資產階級哲學家的估計上，犯了客觀主義的錯誤，及無意識地做了資產階級哲學家的俘虜；（四）亞歷山大洛夫同志在關於研究哲學史的目的性問題上，也忽視了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任務，而陷於學院派的泥塘中。

在其發言的第二部份中，日丹諾夫同志對目前的蘇聯哲學陣線，作了嚴格的批判，指出其存在着『嚴重的病態』，即戰鬥性不足和客觀主義。他指出蘇聯反對法西斯主義大賤的勝利，乃是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意義的光榮勝利。法西斯主義的失敗，也就是唯心主義的最後破產。現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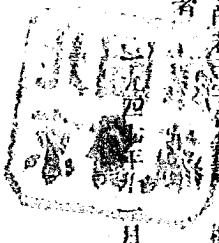
當腐化透頂的垂死的資產階級又檢起各種形式的卑鄙污濁的唯心主義學說，來毒化資本主義各該勞動人民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已經移到美國和英國去了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正應該更高舉勝利的馬克思主義大旗，領導對資產階級腐化思想的鬥爭，並幫助新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以科學的社會主義來照耀他們的前途並武裝他們的思想。同時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提出了許多的新的經驗，也需要蘇聯的哲學家來總結並以之發展馬克思主義。日丹諾夫同志要求蘇聯哲學家像馬、恩、列、斯這些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一樣地工作，迎接這些光榮的歷史任務。

同時，日丹諾夫同志在其發言中，更提出並解決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他說這一動力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他說：「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對於我們哲學家不僅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且是一個深刻的理論問題。」它是我們黨早經發現、並早經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但是却沒有人去研究。

日丹諾夫同志向蘇聯哲學家所提出的問題，及其對亞歷山大洛夫同志「哲學史」的批判，特別是他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的重要論點，無疑對我們正在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勝利而進行鬥爭的實際工作者，亦有巨大的意義。

由於立三同志不可能親自校閱他的譯文，因此本書中可能有的若干錯誤，概由我負責。

編者



日丹諾夫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

在討論

亞歷山大洛夫「西歐哲學史

一書討論會上的發言

同志們！關於亞歷山大洛夫一書的討論，沒有局限於這個题目的範圍，而開展得更廣泛更深刻，提出了我國哲學戰線狀況的一般問題。這次討論變成了一種關於科學的哲學工作狀況中各種問題的全蘇聯討論會議。當然，這是完全自然而合理的。編輯哲學史教科書，編輯第一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史教科書，是一個有重大科學意義和政治意義的任務，所以中央委員會組織這一次討論，特別注意這個問題，決不是偶然的事。

編輯一部好的哲學史教科書，這就是給我們的智識份子、我們的幹部、我們的青年一種新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時也就是在發展馬克思、列寧哲學的道路上前進一大步。因此在這次會議上，對於這部教科書提出了這樣高的要求，是當然的事。因此，擴大討論的範圍，也是有益處的事。討論的結果，無疑地會是很巨大的，尤其是因為在討論中不僅說到了那些與估計這本教科書有關的問題，而且說到了哲學工作中許多更廣泛的問題。在我的發言中，想把這兩方面的問題都說一說。我絕不是想來做討論的總結，因為這是這本書作者的任務。我只是發表我個人的意見。

我要預先請大家原諒，在我的發言中，將要作些引證，雖然巴斯金同志極力反對我們這樣做。當然他是哲學大海中的老航海家，可以憑眼光、憑想像，在哲學的巨洋中駛來駛去，用不着羅盤針的（笑聲）。可是，我只是一個在哲學海洋中航行的見習生，初次坐在顛簸搖擺的船上，遇到這樣大的哲學風浪，只好拿引證作羅盤針，以免迷失方向（笑聲鼓掌）。

現在說到對於這本教科書的意見。

一 論亞歷山大洛夫所著教科書中的缺點

我想，我們對於哲學史教科書有權要求它遵守下列條件，這些條件在我看來是起碼的條件

第一，哲學史教科書需要對於哲學史這門科學下一個確切的定義。
第二，哲學史教科書必須是合乎科學的，也就是說，要以現時所達到了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成就為基礎。

第三，哲學史的敘述，應當是創造性的，而不應當是繁瑣哲學式的，必須與現時任務直接連系，以便說明這些任務並指出哲學繼續發展的前途。

第四，引用的實際材料，應當是經過審查完全可靠和適當的。
第五，敘述的文字應當是明確易懂使人信服的。

我覺得亞歷山大洛夫的這本教科書，是沒有滿足這些要求的。
首先說到關於這門科學的定義。

威涅科同志指出過，亞歷山大洛夫同志寫的教科書，沒有給人們關於這門科學以明確的概念。雖然在書中寫了許許多多定義，可是都只有局部的意義，其中沒有一個是可以概括一切的總結定義，因為每個局部的定義，都只說明問題的某一方面。這個批評是完全正確的。作為科學的哲學史的定義，是始終沒有闡明的。在該書第十四頁上的定義，是不完全的；在該書第二六二頁上所下的定義，作者加上了着重點，大概是作者認作基本定義的。實質上，這個定義是不正確的。作者說：

「哲學史就是人類對於周圍宇宙的知識之前進、上昇、發展的歷史。」

根據作者這個定義，那就是說，哲學史研究的對象，是與一般科學史相符合的。而哲學本身就好像是科學的科學。這種觀點，是馬克思主義老早已經駁斥了的。作者又說：

「哲學史也就是說明許多現代思想如何發生和發展的歷史。」

這也是不正確的，不確切的。因為這里是把「現代」這一名詞當成是「科學」這一名詞的同

樣議論。這當然是錯誤的。在下哲學史定義時，必須從馬、恩、列、斯所下的作為科學的哲學的定義出發。

「黑格爾哲學的這一革命的方面，是馬克思接受和發展了的。辯證唯物主義不需要人們把它叫做什麼站在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以前哲學所剩下的只有「關於思維及其規律的學說！即形式邏輯和辯證法。辯證法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也是一樣），是包括現在所謂辯證論的。認識論的內容，同樣應當是歷史性的，就是研究和總結認識的來源與發展，研究從不知到知的過渡」。〈見列寧全集十八卷第十一頁〉

因此，科學的哲學史，是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及其規律的胚胎、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唯物主義既然是與唯心主義派別鬥爭中生長和發展起來的，那麼，哲學史也就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鬥爭的歷史。

從利用現代已經達到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成就之觀點，來觀察這本書的科學性，那麼，這本教科書也是犯了許多非常嚴重的毛病。

作者把哲學史以及哲學思想和哲學體系的發展過程，描寫成爲由於數量變遷、生長而發展的平穩進化過程，這就使人們想像，以爲馬克思主義簡單是從前進步學說發展的繼承人，首先是法國唯物主義、英國政治經濟學以及黑格爾唯心主義學派發展的繼承人。

作者在四七五頁上說，「馬、恩以前的哲學理論，雖然有時也包含有偉大的發現，但總不是貫徹到底，和在一切結論上都合乎科學的。」這樣的定義，把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體系之不同點，看作只是在一切結論上貫徹到底的，和合乎科學的。那麼，馬克思主義以前的哲學，與馬克思主義的不同點，只在於這些哲學是不貫徹到底和不合乎科學；那麼舊哲學家只是「犯了錯誤」而已。

我們看，這就只是數量變化，這就是形而上學的辦法。馬克思主義的產生，是哲學中的真正的發現，真正的革命。當然，這也與一切其他的發現、一切其他的突變、漸變的中斷、一切其他的到新形態的過渡一樣，不能不有預先的數變的積累，在這裏就是說，不能不有馬、恩偉大發現以前的哲學發展的總結。顯然作者不懂得馬克思和恩格斯創造了新的哲學，在質量上與所有以前的、包括進步哲學體系在內的、一切哲學體系不同的哲學。關於馬克思哲學對以前哲學的態度，以及馬克思主義在哲學中所作的革命；把哲學變成科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特別使人奇怪的是，作者不集中注意去說明馬克思主義中與以前的哲學體系比較起來，那些是新的和革命的東西，却注意到把馬克思主義與以前的哲學發展連接起來。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就說過，他們的發現，就是舊哲學的終結。

「黑格爾體系想像它自己是一種站在其他一切科學之上的特殊科學，這就是此後的最完整的哲學形態。黑格爾哲學體系的破產，就成了整個哲學的破產。剩下來的是只有辯證的思維方法，以及把整個自然世界，歷史世界和精神世界當作是永恆運動、永恆變化、經常處在發生和消滅過程中的那種了餘。現在不僅在哲學面前，而且在一切科學面前都提出了同樣要求，就是要去發現每個部門中這種變革的永恆過程之規律，這也就是黑格爾哲學留給它的繼承人的遺產。」（見恩格斯「反杜林」）顯然，作者不了解哲學發展具體的歷史過程。

這本書最重要的缺點之一，也可說是最主要的缺點，就是忽略了以下的事實：即在歷史過程中，不僅對於某些哲學問題的觀點起了變化，而且所有哲學問題、整個哲學內容，都在經常變化着。這是與人類認識之辯證本質完全符合的，而且應當是每個真正懂得辯證法的人都明白的。

在該書第二十四頁申論到古代希臘哲學時，亞歷山大洛夫說：

「哲學之成爲獨立的知識部門，發生在古代希臘奴隸社會時代。」又說：「哲學之成爲

知識的特殊部門，發生在紀元前六世紀時，並且有了廣泛的傳播。」
 可是，我們要問：可否說古代希臘哲學是已經分化出來了的特殊知識部門呢？當然不能這樣說。古代希臘人的哲學觀點，是與自然科學觀點、政治觀點密切糾纏的。我們不應當而且沒有想把後來發生的科學分化和分離、加到希臘時代的科學身上去。老實說，希臘人祇知道一種沒有分類的科學，其中也包括哲學概念在內。例如德模克里特、伊壁鳩魯、亞里斯多德，所有這些哲學家，都證實了恩格斯的話：「古代希臘哲學家，同時都是自然科學家。」（見恩格斯：『自然界辯證法』）

哲學發展的特點，就在於隨着人類對於自然界和社會的科學知識之發展，從哲學中逐漸分化出各種實證科學。因此，由於各種實證科學的發展，哲學的範圍不斷地縮小了。順便說一句，這個過程直到現在還沒有完結。這種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從哲學權利束縛下解放出來的過程，無論對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或對於哲學本身，都是一種進步過程。

過去妄想認識最終絕對真理的哲學體系之創造者，是不能幫助自然科學發展的，因為他們把自然科學束縛在他自己的公式中，力圖站在科學上面，把不是從實際生活中得出的、而是從他的體系需要中得出的結論，勉強加到活的人類認識上去。在這些條件下，就使哲學變成了一種博物館，把各種不同的事實、結論、假說、甚至幻想，都陳設在一塊。那時哲學家至多只能成爲幫助人民觀察事物的工具，決不能成爲實踐上影響世界的工具，也決不能成爲認識世界的工具。這種哲學的最後一個體系，就是黑格爾體系。他企圖建立一座壓在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宮殿，把各種科學削足適履，局限於他所規定的範圍之中。他指望解決所有一切矛盾，却陷於與辯證法矛盾的沒有出路的狀態中。這種辯證法，是他構想到的，可是沒有了解的，因此，也就是運用不正確的。

恩格斯說：

「既然我們懂得要求哲學解決所有一切矛盾，就無異是要求一個哲學家做到全人類在其前進發展中才能做到的事情。既然我們懂得了這一點，那麼舊意義的哲學就終結了。我們就要拋棄用這種方法所不能達到的東西，就要拋棄個別人所想像的『絕對真理』，而去力求按照各種科學所指示的道路，並用辯證法把各種科學底成果綜合起來，以求得所能達到的成就，即我們所說的相對真理。」（見恩格斯著費爾巴赫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發現，就是舊哲學的終結，即妄想包羅萬象地解釋世界的那種哲學的終結。本書作者着重子說明馬克思與以前哲學家的聯系，而不闡明從馬克思起，開始了哲學歷史上的一個完全新時期，即第一次使哲學成爲科學的事實。這種模糊不清的說法，就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的哲學發現之偉大革命意義，完全抹煞了。

與這種錯誤觀點密切關聯的，還有以下的錯誤：就是在這本書中鼓吹一種對哲學史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把哲學的歷史當作是各種哲學派別的逐漸更替。其實，從馬克思主義成爲無產階級科學世界觀的時候起，哲學史的舊時期就終結了，在那個舊時期，哲學只是個別人們的事情，只是少數哲學家及其門徒所組成的哲學學派專有的財產。這般人都是脫離實際生活，脫離人民與人民毫不相干的。

馬克思主義不是這樣的哲學派別。相反的，它是征服這種舊哲學，征服這種成爲少數天才人物、貴族知識份子所專有的哲學而產生的。它是哲學史上完全新時代的開始，從此以後哲學成了無產階級羣衆爲擺脫資本主義壓迫而鬥爭的科學武器。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以前的哲學體系不同，它不是站在其它科學之上的科學，而是一種研究的工具，而是一種貫串一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同時這種方法又以這些科學在其

發展過程中所得的成就，而更加豐富起來。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對於其以前一切哲學最完滿而堅決的否定。但正如恩格斯所說，否定並不是簡單說個不字，否定的本身包括有繼承性，就是吸收人類思想歷史上已達到的所有一切前進的和進步的東西，加以批判的改造，並統一為新的更高的綜合。

因此，既然有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存在，在哲學史中就應當包括辯證法產生的歷史，表明辯證法產生的條件是什麼。在亞歷山大洛夫的書中，沒有說明邏輯學和辯證法的歷史，沒有闡明邏輯範疇是人類實踐反映的發展過程。雖然在本書導言中，引用了列甯所說每一個辯證邏輯範疇，都應當看作是人類思想歷史上的交叉點的話，實際上，他把這句話懸在空中了。

在這本教科書中，把哲學史僅僅敘述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時止，即是到一八四八年止，這是毫無理由的。不敘述最近一百年的哲學歷史的教科書，當然不能算作教科書。

為什麼作者這樣無情地割棄了這個時期，是令人無從了解的。無論在序言中或導言中，都沒有加以解釋。

在本書中沒有包括俄國哲學發展史，也是沒有說明絲毫理由的，無須說明，這種忽略是有原則意義的。不管作者根據何種理由，把俄國哲學史從一般的哲學史中勾去，抹煞不說，客觀上總是降低俄國哲學的作用，並且人為地把哲學史分成西歐哲學史和俄國哲學史。同時，作者又沒有作絲毫解釋，說明這種劃分的必要。這樣，就是肯定了資產階級把文化劃分為西歐文化和東方文化的觀點。這樣，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西歐的地方性的思潮。況且在導言第六頁上，作者會極力證明一個相反的論據，堅決主張：不仔細研究和利用以前俄國著名哲學家對於過去哲學體系的深刻批評，就不能得到關於西歐哲學思想發展過程的科學概

念；那麼爲什麼作者在自己的教科書中，不實現這個正確的論據呢？這是完全不可了解的。這與作者任意把哲學史僅僅敘述到一八四八年止這件事，同樣給予人們一種惡劣的印象。

以前發言的同志指出在這本書中沒有闡明東方哲學史的這個缺點，也是很正確的。顯然就是根據這個原因，這本教科書也需要根本改造的。

有些同志指出，該教科書的導言顯然是作者的「信條」，作者正確規定了研究哲學史的任務和方法，可是作者沒有履行自己的諾言。我想這種批評是不夠的。因爲導言本身就是不正確的，經不住批評的。我已經說過，對於哲學史定義下的不正確和不確切，但不僅如此，在導言中還有其他理論上的錯誤。已經有同志說過，圖明馬列主義哲學史基礎時，引用車爾尼舍夫斯基、杜勃洛留波夫及羅曼洛索夫的話，是很勉強的，因爲他們是與本題沒有直接關係的。但問題還不僅在這裏，書中所引用的這些俄國大學者和哲學家們的話，顯然是不適當的，其中所包含的理論原則，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是不正確的，我敢說甚至還是有害的。但我絲毫也不想損害這些學者的威信。因爲這些引文採用的不適當，並且這些引文的本來動機是與作者所打算的毫不相同。因爲作者所引用車爾尼舍夫斯基的話，是爲了證明各種哲學體系甚至互相對立的哲學體系創造者應當互相忍讓。引用的車爾尼舍夫斯基的話如下：

「從事科學工作的後起者，總是反對他們的前輩，這些前輩及其著作，本是他們自己著作的出發點。例如亞里斯多德小視柏拉圖，蘇格拉底極端鄙視他所繼承的詭辯論者。在近代也可找到不少這樣的例證，可是也有一些可喜的例子。某些新體系的創造者，明白了了解他的意見是與他們的先輩的思想有聯系的，而很謙虛地把自己稱爲這些先輩的學生。當其發現這些先輩見解中的缺點時，他們同時還明白指出，這些見解對於他們自己思想的發展有多麼大的幫助，例如斯賓諾莎對於笛卡兒就是如此。我可以說，現代科學的創造人，總是對於他們

的先聲表不敬意和愛戴，完全承認他們天才的偉大以及他們學說的高尚品質。在這些學說中表現了現代科學創造者的觀點的胚胎，這是很光榮的事。」（見亞歷山大洛夫所著教科書第六頁至第七頁）

作者引用這段話，沒有加半句評語，可見這就是他自己的觀點。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作者真正走上了拒絕馬列主義所固有的哲學中的黨性原則。馬列主義經常與一切唯物主義的敵人進行激烈鬥爭的不調和性和熱情，是大家都知道。在這種鬥爭中，馬列主義者總是給敵人以致命的批評。列甯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是用布爾什維克精神對唯物主義的敵人作鬥爭的模範。在這本書中，列甯所寫的每一句話，都好像是刺殺敵人的利劍。列甯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正在幾乎半世紀的長時期中擴展唯物主義，推進哲學中的這一基本方向，不停止在重覆那些已經解決了的認識論問題，而把唯物主義貫徹到底。他們表明了應當怎樣把這個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科學中去，把那些想發現哲學的「新」路線，發明「新」方向的企圖，當作是空話和野心家的浮誇妄想，而無情地掃除乾淨。」

列甯接着寫道：

「最後我們再看馬克思在資本論以及其他著作中所說的對個別哲學問題的意見。他永遠不變的基本理由，就是堅持唯物主義而恥笑那些模糊不清的觀點和糊塗觀念，以及對唯心主義的讓步。馬克思所有關於哲學的意見，總是論述這兩個基本對立的方向——從學院派哲學觀點看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缺點，也正在於這種「狹隘性」和「片面性」。」（見列甯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七五至二七六頁）。

大家知道，列甯自己也是毫不憐惜敵人的。列甯是把那些想抹煞和調和哲學派別之間的矛盾的企圖，認為只是反動的學院派哲學家的詭計。既然如此，亞歷山大洛夫同志怎麼能夠在其所著

的教科書中，宣傳對哲學敵人的慈悲觀念，這種宣傳無疑是替學院派偽客觀主義發勞，而馬列主義却是在與一切唯心主義派別代表 作無情鬥爭中生長起來和戰勝了的。（鼓掌）

亞歷山大洛夫同志還不僅以此爲限，他把他的客觀主義的觀點，一貫到底的貫串全書。所以他在批評某個資產階級哲學家以前，總是頌揚他們的功績，向他們焚香頂禮。例如，他提到傅利葉論人類發展四個階段的學說時，寫道：

「傅利葉在社會哲學中的最大成就就是關於人類發展的學說。按照傅利葉的意見，人類社會在其發展中經過四個階段：一、上升的破壞階段；二、上升的和諧階段；三、下降的和諧階段；四、下降的破壞階段。在最後這個階段，人類是處在衰老時期。此後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就會消滅，因爲社會發展是不以人類意志爲轉移的。最高階段到來的不可避免，正如一年四季不斷交替之不可避免一樣。傅利葉從這個原理中得出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由自由集團勞動統治的社會所代替。固然傅利葉社會發展理論，僅限於四個階段，可是這種學說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見亞歷山大洛夫所著西方哲學史三五三——三五四頁）。

這裏連一點馬克思主義分析的影子都沒有。傅利葉底理論究竟比什麼是前進一步呢？如果說，這種理論的局限性是在於他說人類發展有四個階段，而第四個階段就是下降的破壞階段，結果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就要消滅；如果這個理論的局限性是在這裏，那麼亞歷山大洛夫同志對傅利葉的批評何在呢？是不是批評他的社會發展論、僅限於四個階段，而其實人類還有第五個死後階段嗎？

亞歷山大洛夫同志幾乎對所有一切舊哲學家，都找到了機會說幾句恭維話，對於聲名越大的資產階級哲學家，也就恭維得越厲害。所有這一切，就使得亞歷山大洛夫同志成爲（也許他自己不覺得）資產階級哲學家史的俘虜。這些哲學家史的出發點，首先是把每個哲學家看作他的同行

，然後才把他看作敵人。這種觀點，如果在我們這裏得到發展機會，必然要引到客觀主義，引到對資產階級獻媚，誇大他們的功勞，剝奪我們哲學的戰鬥進攻精神。而這就是脫離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脫離唯物主義的階級性和黨性。列甯曾教導我們說：「唯物主義是包括了所謂黨性的，使我們必須在估計任何事實時，直接公開站到一定的社會集團底觀點上」（見列甯全集第一卷二七六頁）。在這本教科書中，對於各種哲學觀點的敘述，是抽象的客觀主義的。中立的各種哲學派別，在這本書中，是一個一個先後排列，或比肩平列的，而不是互相鬥爭的。這也就是為學院派效勞。無怪乎作者在敘述哲學中的黨性原則時，說得竟不明確。作者論到哲學中的黨性問題，舉出了黑格爾哲學作例證，把敵對哲學的鬥爭，描寫成黑格爾本身內在的反動原則與進步原則的鬥爭。這種證明方法，不僅是客觀主義的折衷論，而且顯然是替黑格爾粉飾。因為這樣就是想證明，在黑格爾哲學中的進步方面與反動方面是一樣多的。爲了結束這個問題，我還要補充一點。亞歷山大洛夫同志採用的估計各派哲學體系的方法是除了功績以外，還有缺點（見亞歷山大洛夫所著教科書第七頁），或者這種理論也有重要意義。這是極端不肯定的，是形而上學的，只會把問題弄得一場糊塗，我們不了解的是，爲什麼亞歷山大洛夫同志需要替舊資產階級學院派的科學傳統效勞，而忘記要求與一切敵人作不調和鬥爭的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

還有一個批評。當用批判眼光來分析哲學體系時，應當向着一定的目標。早已擊潰和早已埋葬了的哲學觀點和哲學思想，用不着多去注意它；反之，對於那些爲馬克思主義敵人所利用而風行一時的那怕是顯然反動的哲學體系和哲學思想，都應當特別尖銳的加以批評。在這類哲學體系中，特別應當注意批判新康德主義、神學、新舊各派的本體不可知論，以及所有那些想用走私的辦法把上帝及其一切其他貨物偷運到現代自然科學中去的企圖，這種企圖的目的，就在於粉飾和粉飾那些唯心主義的陳貨，出賣到市場上去。這就是現時帝國主義的哲學奴僕們爲了支持那些驚

惶失措的主人而使用的武器。

在導言中對於反動思想和進步思想以及哲學體系概念的解釋，也是不正確的。雖然作者說過，關於某種思想和哲學體系所含有的反動性和進步性問題，要由具體歷史條件來決定。但是他常常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大家知道的原則，就是同一思想，在不同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可能有不同的性質。在某一種條件下是進步的，另一種條件下是反動的。作者抹煞了這個問題，就是故留洞穴，讓那些所謂思想具有超歷史性的唯心主義觀點，能偷運進來。

再者，作者正確的指出了，哲學思想底發展歸根到底是由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哲學思想的發展只有相對的獨立性。可是他自已累次違犯了這個科學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他往往在敘述各種哲學體系時，把這種敘述與某一哲學產生的具體歷史環境以及社會階級根源脫節。例如：在敘述蘇格拉底、德模克里特、斯賓諾莎、萊布尼茲、費爾巴赫以及其他人的哲學觀點時，就是這樣。這當然是不科學的，這就使人有根據的來想，作者是迷誤到哲學思想發展具有獨立性和超歷史性的觀點上去了。而這種觀點就是唯心主義哲學具有的特點。甚至在作者想去分析某一哲學體系產生的環境時，在敘述中也看不見這一哲學體系與具體歷史環境之間的有機聯系，結果是純粹機械的文字上的聯系，而不是本質上的有機聯系。敘述某些時代哲學觀點的章節，與那些敘述歷史環境的章節平行排列着，並且所敘述的歷史事實以及其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因果聯系，一般說來，都是不科學的，不精確的，不能給以分析的材料，而只是一種不好的記事錄。例如第六章：法國在十八世紀時代的導言，就是如此。這個導言之含糊不清簡直透頂。一點也不能解釋法國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期哲學思想的根源，因此法國哲學家的這種思想就缺乏與時代的聯系，而成爲好像一種獨立現象似的。讓我把該書中這段話念給大家聽聽吧：

「從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起，法國隨着英國之後，逐漸走上資產階級發展的道路。在一

百年過程中，在經濟，政治和思想各方面，都起了根本的變化。法國當時雖然還是落後的，可是已經開始擺脫封建專制性。正如當時許多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法國也進入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在社會生活各方面都迅速形成了新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產生了新的思想新的文化。這時法國的城市如巴黎、里昂、馬賽和加佛爾等，都迅速發展起來，建立了強大的海軍，國際貿易公司相繼創立，並組織了武裝遠征隊，佔領了許多殖民地，商業迅速發展起來。在一七八四年到一七八八年，對外貿易的流通總額達到了十萬萬零一千一百六十金里佛爾，較之一七一六年到一七二〇年，增加了四倍以上。亞亨條約（註）幫助了商業繁榮，特別是圖書的貿易，發展得更快。例如在一七七四年，法國圖書的貿易總額為四千五百萬法郎，同時英國却只有一千一百萬到一千三百萬法郎。法國擁有半數歐洲存儲的黃金，但是法國仍舊是一個農業國家，大多數居民都是經營農業。（見該書三一五——三一八頁）當然這不能叫作分析，而只是一種某些事實的羅列。並且這些事實不是互相聯系，而是比肩排列着。自然從這些所謂關於「基礎」的事實中，沒有得出法國哲學的特點，而且也不能得出。這樣，法國哲學的發展成了與當時法國歷史環境脫節的了。

再看亞歷山大洛夫在這本書中描寫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產生的情形吧。他寫道：

「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期，德國是一個落後的和具有反動政治制度的國家。在德國佔統治地位的，是封建農奴制度和手工業行會制度。在十八世紀末葉，城市居民還不到百分之廿五，從事手工業的只佔全體居民中百分之四，剝奪農民的勞役制——農奴制、行會特權等，妨害了當時已經產生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又加上在政治方面是處在極端分裂狀態中」。

按照亞歷山大洛夫的意思，引用德國城市居民的百分比，是想表明這個國家的落後和國家制

度與社會政治制度的反動性，但是這時法國城市居民還不到百分之十。然而法國當時並不像德國一樣是封建落後的國家，而是歐洲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由此可見，城市居民百分比，本身還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而且這件事情的本身還需要從具體歷史環境中來說明的。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表明沒有適當地利用歷史材料來說明某一思想形態的發生和發展。

——萊特亞歷山大洛夫寫道：

「當時德國資產階級著名的思想家，如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在其所創立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中，用德國當時實況所制約的抽象形式，表現了當時德國資產階級的思想。」
我們且來把這個冷淡的、漠不關心的、客觀主義的、並且無論如何也不能從中得出德國唯心主義產生原因的這種事實描寫法，來與那種用生動的、戰鬥的、使每個讀者感動而信服的文筆，對當時德國環境所作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比較一下。請看恩格斯如何描寫當時德國的環境吧：

「這簡直是一堆瀰爛了腐朽了的東西，誰也不覺得好過。手工業、商業、工業和農業都衰頹到了極點。農民、商人和手工業者遭受下面兩種壓榨：骸骨吸髓的政府和衰微的貿易貴族和王公，雖然盡量榨取了奴僕底血汗，總還覺得要增加收入來彌補日益增長的開支，一切糟粕，全國都不滿意，沒有教育，沒有啓發羣衆智慧的工具，沒有言論出版自由，沒有多少大量的國外貿易，到處都是卑鄙和自私。全體人民都充滿了卑下的、奴顏婢膝的、可恥的、嗜利是圖的心理。一切都腐朽了，搖擺了，眼看就崩潰了，甚至沒有好轉的希望，因為在民衆中沒有一種能夠掃除這種僵屍制度底腐朽的力量。」（見馬克思全集第五卷六——七頁）

（註）亞亨條約是一七四八年拿破崙與國王位繼承權戰爭後，英國及尼得蘭與法國簽訂的和平條約。

我們來把恩格斯這個鮮明、尖銳、確切和深刻科學的描寫，與亞歷山大洛夫的描寫比較一下，就可看出，亞歷山大洛夫同志沒有很好的從馬克思主義創造者所留給我們的無窮財富中，利用現成的材料。

由此可見，作者沒有完成唯物主義方法來敘述哲學歷史的任務。這就使這本書喪失了科學性，把它變成大半是記載各哲學家傳記以及他們的哲學體系，並且這種記載是與當時歷史環境脫節的。這就違反了下面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

「想要說明從各種社會形態中發生的政治觀點、私有觀點、哲學觀點、宗教觀點等等，首先就要詳細研究這些社會形態生存的條件」。（見恩格斯於一八九〇年八月七日致史密德信）

作者對於研究哲學史的目的，也是表述得不明確和有缺點的。作者在本書中沒有一個地方說過，研究哲學和哲學史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繼續發展已成爲科學的哲學，找出新的規律，在實踐中檢閱舊的原則，用新的原則來代替已陳腐的原則。作者主要是從教授哲學歷史的意義出發，從文化教育的任務出發，因此把研究哲學史的全部事業當作消極觀察的學院式研究，這當然是與馬列主義所規定的作爲科學的哲學定義不符合的，哲學也像任何科學一樣，應當不斷用排除陳腐的原則，增添新的原則而發展起來，完善起來，豐富起來。

作者專注意於教育的目的方面，由此就給哲學的發展造成止境，好像馬列主義已經達到了頂點，而發展他們的學說已經不是主要的任務了。這樣的議論是與馬列主義的精神矛盾的。因爲這就是已經開始用形而上學的觀點，把馬克思主義看成已經是完成到底了的學說，這就只能使生活濫富於探求精神的哲學思想，趨於枯竭。

寫作哲學史要不損害它的科學性，就不能不注意與自然科學成就的聯系。作者在闡明自然科

學發展問題時，也是極不完善的。

在這本書中，由於這個緣故，就使人無法了解那從現代自然科學成就的強固基礎上，生長起來的科學唯物主義之產生和發展的條件。

亞歷山大洛夫敘述哲學歷史時，却把它和自然科學歷史脫節了。例如：在導言中敘述該書基本觀點時，作者一句話也沒有說到哲學和自然科學的相互關係，甚至在似乎決不能不說到自然科學的時候，他也一字不提。例如，在第九頁上作者寫道：

「列甯在其各種著作中，特別是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詳細研究了並且大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的學說」。當他說到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時，竟能毫不提到自然科學問題以及自然科學與哲學聯系問題。

作者對於這個時期自然科學發展水平的描寫所表露的極端貧乏、歪曲和抽象性，也是「一目了然的。例如：論到古代希臘自然科學時，只說在當時有了『自然科學的胚胎』（見二六頁）；論到後期繁瑣哲學時代（十二世紀到十三世紀），只說了那時『發現了許多發明和技術的改進』（見二二〇頁）

當作者想來說明這樣模糊不清的話句時，只是列舉了一些對此很少聯系的發現，同時並作出了驚人的錯誤，令人驚訝作者對於自然科學問題簡直毫無常識。例如：描寫文藝復興時期科學發展時寫道：

「學者格里克製造了著名的利用空氣的唧筒，而大氣壓力的存在代替了真空的概念。這一事實，最初是由於在馬克登堡關於半球儀器的試驗已經證明了的。人們在幾世紀中爭論過「宇宙中心」到底在什麼地方，可不可以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可是在科學界出現了哥白尼，接着是伽利略這兩個偉大學者。伽利略證明在太陽上有黑點，並且黑點地位經常改變。

他根據這件事實以及其他的發現，證明了哥伯尼的太陽系是以太陽為中心的學說。風雨表教會了人們能預知天氣。顯微鏡的發明代替了以前對於極微小的有機體生命存在的推測辦法，這在生物學發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羅盤針幫助了哥倫布用實踐的辦法證明地球是球形的結論。（見一三五頁）

這裏幾乎每一句話都是荒謬可笑的。怎麼可以說大氣壓力可以代替真空的概念？難道空氣的存在就否定了真空的存在嗎？怎麼太陽黑點的運動就證實了哥伯尼的學說呢？

關於風雨表預告天氣的事情，可以說至今還是極不科學的。可惜得很，人們直到現在還沒有學會預告天氣的知識。你們大家從我們氣象台的實際工作中，就知道得很清楚的。（笑聲）

再者，難道顯微鏡可以代替推測辦法嗎？最後，怎麼說「地球是球狀結構」呢？至今我們都以為球狀二字只能用來形容物體形狀的。

類似上述這類的寶貝，在亞歷山大洛夫書中，是很多的。但是作者還犯了更嚴重的原則性的錯誤。例如，在第三五七頁上他認為辯證法是「在十八世紀後半期」的自然科學成果所已經準備起來了的。這根本與恩格斯著名的學理相矛盾。恩格斯說辯證法是有機物細胞組織的發現、能力不減和能力變化說、以及達爾文學說所準備起來的。所有這些發現都是在十九世紀時代。作者從他的錯誤的觀點出發，於是用了很多的篇幅來列舉十八世紀的發現，詳細敘述了加爾萬尼、拉伯拉斯、雷也列（註）。可是關於上述恩格斯指出的那三個偉大的發現，僅僅說了下面一句話：「例如發爾巴赫還在世的時候，就創立了細胞學說、能力變遷說，出現了達爾文說明物種來源的天演論」。（第四七九頁）

這本教科書的基本缺點，就是如此。我不來說那些局部的次要的缺點，我也不想重覆以前發言人已經說過的非常有價值的關於理論和實際方面的批評。

結論就是這本教科書很壞，需要根本改造。但是要改造這本教科書，首先就要克服那些不正確的和糊塗的觀點，這類的觀點顯然在我國哲學家，包括領導的在內，都是很流行的。因此，我就要說到第二個問題，關於我國哲學戰線狀況的問題。

二 論我國哲學戰線的狀況

如果亞歷山大洛夫這本教科書得到了我國大多數負責任的哲學工作人員的贊同，把它提交了斯大林獎金委員會，希望獲得斯大林獎金；把它推舉為教科書，並且獲得了無數讚揚的評論；那麼其他的哲學工作人員，也顯然都同意亞歷山大洛夫的錯誤觀點。這就表明我國理論戰線上有了嚴重的病態。

這本書沒有引起多少重大的抗議，以至需要中央委員會和斯大林同志親自干預，才揭發這本書的缺點，這件事實就表明我們哲學戰線缺乏廣泛的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沒有創造性的討論，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就不能不使科學的哲學工作發生嚴重的病態。大家知道，哲學的著作數量上很不够，質量上也差。哲學專著和論文，都是很少看見的。

這裏有許多人，說過需要出版哲學雜誌，出版這樣的雜誌研究，是否必要還是值得考慮的。『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雜誌留在我們腦海中的可悲的教訓，尚未消失。我覺得現在發表哲學專著和論文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是利用得十分不够。斯維特洛夫同志在這裏說：『布爾什維克』

(註) 加爾萬尼是十八世紀意大利的醫學家與物理學家；拉伯拉斯是十八世紀法國的數學家與天文學家；雷也列是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蘇格蘭地質學家。

雜誌的讀者，不完全適合於專門性質的理論作品，我想這是完全不對的。這顯然是由於對我國的讀者及其需要的高度水平估計不足。這樣的意見，我以為是由於不了解我國哲學完全不是少數職業哲學家的財產，而是全體蘇維埃知識界的財產。革命以前的俄國，先進的雜誌，真數很多的厚本雜誌，除了登載文學著作以外，還登載各種科學著作，其中也包括有哲學著作。這種傳統沒有半點不好的地方。我們的『布爾什維克』雜誌的讀者，比任何一個雜誌的讀者多得多，若把我們哲學家底創作封鎖在專門的哲學雜誌裏，我以為有使我國哲學工作的基礎縮小的危險。請不要誤會，以為我是反對刊印哲學雜誌的。可是我覺得在我國多種厚本雜誌以及『布爾什維克』中，很少登載哲學著作，這就表明，首先要從這些厚本雜誌和『布爾什維克』雜誌來開始克服這個缺點。在這些雜誌上特別是厚本雜誌上，現在也間或登載一些哲學論文，引起科學界和一般讀者的注意。我國哲學工作的領導機關，科學研究院的哲學院、哲學講座等所研究的題材，也是很貧乏的。我覺得哲學院的情形，也是不可樂觀的。它沒有把外省的工作人員統一起來，沒有和他們連系，因此實際上這個機關不是具有全蘇聯性質的。外省의 哲學家的工作，簡直無人過問。大家知道，他們是一個很大的力量，可惜至今沒有利用。哲學著作的題材，包括博士論文在內，都是面向過去，都是些平淡的、不關重要的歷史題目，例如『哥伯尼異端學說的過去和現在』（全場哄笑）。這就引到繁瑣哲學在一定程度上的復活。從這個觀點看來，在這個會議上有關於黑格爾的爭論，也是一件可怪的事情。參加這個爭論的，可說是白費力氣，關於黑格爾的問題，是早已解決了的，重新把它提起來，沒有任何根據。在這次會議上除了早已研究過和估計過的材料外，沒有提出任何新的材料，而且很可惜的是，這次爭論是純粹繁瑣哲學式的。其毫無結果，正好像從前在某些教派中，爭論研究用兩指還是用三指畫十字才合乎正教的規律，或是爭論上帝是否創造他自己所不能舉起的石頭，或者聖母是否處女等等一樣（笑聲）。現時的緊迫問題，幾乎全不研

究。所有這一切將要產生莫大的危險。這種危險的程度，要比你們所能夠想像到的大得多。最大的危險就在於你們當中某部分人已經習慣於這些缺點而不自覺了。

在哲學工作中，看不到戰鬥精神和布爾什維克的工作速度，在哲學界中，對這本教科書的那些錯誤觀點，與哲學戰線中所有其他部分落後的事實，互相呼應。由此可見，這不是個別的偶然因素，而是整個的現象。在會議上常常運用「哲學戰線」這一名詞，老實說來，這條戰線究竟在那裏？現在哲學戰線不很像我們關於戰線的概念。提到哲學戰線這一術語，馬上就令人想到有一個由許多戰鬥哲學家組成的隊伍，而且這些哲學家是由完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武裝起來的，他們向國外敵對的思想，向國內蘇聯人意識中，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作全面的進攻，把俄國的科學不斷推向前進，並以相信我們的道路是合乎歷史規律的意識，以及有科學根據地相信我們事業必然獲得最終勝利的意識，把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武裝起來。

難道現在我國的哲學戰線像一條真正的戰線嗎？它也許更像一潭死水，或者是一個離開戰場很遠的安靜的宿營地，戰火尚未燒到面前來，大部分尚未與敵人接觸，偵察工作沒有進行，武器生鏽了，個別戰士盲目作戰，指揮官或者沉醉於以往的勝利，或者爭論着現在是否有力進攻，需要外國的幫助；或者爭論意識可以落後於現實生活多少，才不會顯得過於落後（笑聲）。

同時我們黨却極端需要提高哲學工作。在我國社會主義生活中，每天發生的各種迅速變遷，我國的哲學家不去總結，不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觀點去闡明，這樣就阻礙了我國哲學繼續發展的條件，於是就弄到哲學思想的發展，大半與我們職業哲學家無關，這是絕對不可容許的事。當然，哲學戰線落後的原因，完全不是客觀條件造成的，客觀條件在任何時候都便利，等我們去作科學分析和總結的材料，可說是無窮無盡。哲學戰線落後原因，應當在主觀方面去找尋，這種原因，在基本上是與中央分析其他思想戰線方面的落後時、所發現的原因相同。你們記得中央關

於思想問題的著名決議，極力反對在文學和藝術中毫無思想和不問政治的傾向，反對脫離時代題材，逃避到過去領域中去，反對崇拜外國，堅持在文學和藝術中必須具有布爾什維克的戰鬥的党性。大家知道，在我國思想戰線中有許多隊伍，已經從中央的決議中作出了應有的結論，并在這條道路上獲得了很大的勝利。可是我們哲學家在這方面落後了，顯然他們沒有看見在哲學工作中無原則和毫無思想的事實，沒有看見輕視現在題材的事實，沒有看見奴顏婢膝地崇拜資產階級哲學的事實。他們大概認為，在思想戰線上的轉變，是與他們無關的。現在大家都看見，這個轉變是必需的。

關於哲學戰線落後於其他思想部門工作的事實，大半要歸罪於亞歷山大洛夫同志。可惜他沒有具備用銳利的批評，來揭露工作缺點的能力。他顯然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而不依靠廣泛的從事於哲學工作同志的經驗和知識，加之他過去在工作中依賴很少幾個他最親近的同人和一些崇拜天才的人們（喊聲：對呀！鼓掌）。哲學的活動，竟為少數哲學家集團所壟斷，大多數哲學家特別是外省哲學家，沒有被吸收引來參加領導工作，這樣哲學界中的正常相互關係就被破壞了。

現在大家都看出，編輯哲學史這樣的工作，不是一個人可以勝任的。本來亞歷山大洛夫同志應當一開始就廣泛吸引各種著作家，如辯證法學者、歷史唯物主義者，歷史學家，自然科學家，經濟學家等來參加工作。亞歷山大洛夫同志却選擇了一條編輯教科書的不正確的道路，就是不依靠廣泛的博學的人們，這個錯誤是必需改正的。哲學知識，在我們當然是蘇維埃哲學家廣大集團的財產。吸引多數著作家來參加編制教科書的辦法，現在校訂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已完全採用了的。這本書最近就要出版，在校訂工作中，廣泛的聘請了學者參加，不僅有經濟學家，而且有歷史學家和哲學家。這種創作方法是最可靠的方法，其中還包括另一個意思，就是把現在相互關

沒有充分運系的，思想戰線上各種工作人員的隊伍、統一起來，共同努力，解決有一般科學意識的巨大任務。這樣一來，使思想界各部門工作人員互相影響，以免各自為戰，互不相謀，而能有組織和團結的作戰，因此就可以最有保證地獲得勝利。哲學戰線上許多領導工作人員所犯的客觀主義錯誤的根源，究竟在那裏？為什麼在這次討論會上，老一輩的哲學家很公正地責備某些青年哲學家，說他們未老先衰，說他們戰鬥作風和戰鬥精神不夠？對於這一個問題，大概只能有一個回答，就是沒有充分了解馬列主義和存留有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殘餘。這一點在下面的這件事實中，也表現出來。就是許多哲學工作人員，至今還不了解馬列主義這一有生命力的創造學說，是要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和現代自然科學成就基礎上，不斷地開展，不斷地豐富起來的。這種對於我們學說中生動的革命方面估計的不足，就不能不降低哲學的意識和哲學的作用。正由於我們某些哲學家戰鬥作風和戰鬥精神不夠；所以害怕在許多新問題上、現實問題上，試試自己的力量，害怕在解決實踐中每天對哲學家提出的，而哲學家也必須回答的那些問題中，試試自己的力量。現在應當是大胆地把蘇維埃社會的理論，蘇維埃國家的理論，現代自然科學的理論，倫理學和美學，推向前進的時候了。應該消滅這種非布爾什維克的怯弱性。如果讓理論的發展停滯不動，這就是使我們的哲學萎縮，剝奪它具有發展能力的最寶貴的特點，把它變成爲僵屍的枯燥的教條。

關於布爾什維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對於我們哲學家不僅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且是一個深刻的理論問題。如果發展過程的內容，是像辯證法所說的，就是兩個對立方面的鬥爭，舊與新之間的鬥爭，衰亡的與新生的之間的鬥爭，過時的與正在發展的之間的鬥爭；那麼我們蘇維埃哲學家就應當證明：這個辯證法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之下，如何發生作用？適用這個規律的特點怎樣？我們知道這條規律在階級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是與我們蘇維埃社會中不同的。這就是我

們進行科學研究的廣大領域。而我們的哲學家，是沒有一個人對這個領域進行過研究的。其實，我們的黨早已找到一種特殊形式來揭露和克服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矛盾（這些矛盾是存在的，可是我們的哲學家因為胆怯，而不敢提到它們），早已找到蘇維埃社會中那種在新的與舊的之間、衰亡的與新生的之間互相鬥爭的特殊形式，這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并已把它拿來替社會主義服務。在我們蘇維埃社會，已經消滅了互相對抗的階級，因此新與舊之間的鬥爭，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不是表現在對抗階級之間的鬥爭形式中，不是表現在社會生活激烈破壞的變革中（如像資產階級社會那樣），而是表現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形式中，這就是我們發展的真正動力，這就是黨所掌握的強大的工具，這無疑是新的運動形態，新的發展形式，新的辯證規律性。馬克思說：「以前哲學只是解釋世界，現在的問題是在改變世界。」我們改變了舊的世界，並建立了新的世界，可惜我們哲學家沒有充分地解釋這個新世界，並且沒有充分參加這一改變世界的專業。在這裏，我們看見有些人想從「理論上」來解釋這個落後的原因，例如有人說：哲學家過於停滯在解釋工作的時期中，而沒有及時過渡到為專門著作而進行研究的時期。這個解釋，當然是說得很好聽的，但是很難使人信服。當然哲學家現在應當特別注意創作工作，但這並不是說就要縮小註釋工作，更正確些說：通俗化工作。這些工作也是我國人民所需要的，應當加緊努力，補上空過了的時間，任務緊迫，急待我們去解決。在偉大愛國戰爭中所獲得的「光榮的社會主義的勝利」，同時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光榮勝利。這次勝利，對於帝國主義者，好像一根套在它頭上的繩索。現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已經移到美國和英國去了，所有一切黑暗反動的勢力，現在都用來同馬克思主義作鬥爭，又把那些原來是黑暗勢力和僧侶們所穿戴的破爛鎧甲、梵蒂岡和人種論，搬了出來，武裝那些替原子、金元民主主義服役的資產階級哲學，又把那些兇暴的民族主義和陳腐的唯心主義哲學，賣身圖利的黃色報紙，墮落腐化的資產階級的藝術，都搬出來當作武器。

可是大槪力量還不够，現在又在和馬克思主義作思想鬥爭的旗幟之下，動員更深廣的後備軍，市儈、無賴、偵探、盜賊都吸收進去了。隨便舉一個新鮮的例子吧：不久前，「消息報」登載了下面這樣的消息：唯利是圖的撒爾脫所編輯的法國「現代」雜誌上，把黑幕小說家尚善納所作的「小偷日記」極力讚揚，好像是發現了新的真理。這本書一開始就寫道：「欺詐、偷盜、男色，這就是我的主要題材。我的欺詐、盜賊生涯，是與我的尋找情婦有密切聯系的」。著者大概很熟悉這種生涯。尚善納所寫的話劇，大登廣告地在巴黎各個劇院上演，并且尚善納本人現在正被美國極力邀請前往遊歷。這就是資產階級哲學的最新表現。從我國戰勝法西斯主義的經驗中，已經可以看出，唯心主義哲學把許多民族引上了怎樣的絕路，這是大家知道的。現在，唯心主義哲學又以新的可鄙的骯髒的本質出現，這種本質是深刻反映資產階級墮落的卑鄙無恥，在學術界吸收了市井無賴和強盜小偷，這真是到了腐化沒落的極端，但是這些勢力還是有生命力的，還是能够毒害羣衆意識的。現在資產階級科學供給宗教和神學以新的論證，這是必須無情揭破的。例如英國天文學家埃萊克頓關於宇宙常數的學說，簡直像畢發郭里的神祕數學，他從數學公式中，得出了宇宙常數的神祕數字，爲六六六等。愛因斯坦的許多門徒，不了解認識底辯證過程，不了解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的關係，而把研究有限的宇宙領域運動規律所得出的結果，運用到無限的宇宙上去，而說出什麼宇宙的止境，時間與空間底有限性。這類的認識，而天文學家米倫男并計算出了宇宙是二十萬萬年以前創造的。對於這些英國的學者，可以用他們本國的偉大哲學家培根所說的話來批評：「他們把自己在科學上的無能，拿來詭譎宇宙」。同樣，現代資產階級原子物理學家所具有的康德主義的怪想，使他們得出什麼電子具有「自由意志」的結論，使他們企圖把物質描寫成爲只是一些電波總和等等鬼話。

這裏是我國哲學家活動的巨大領域，他們應當分析和總結現代自然科學的成果。他們應當記

得恩格斯的指示：唯物主義「每當有新的、構成自然科學新時代的偉大發現時，就必須採取新的形態」（見恩格斯「費爾巴哈論」）。除了我們，除了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家已經獲得勝利了的國家，還有誰能夠領導反對腐朽和卑鄙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除了我們，還有誰能給資產階級思想以致命的打擊？

多 從炮火的灰燼中生長出來了許多新民主主義國家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社會主義提到了各民族人民生活的日程上，除了我們，除了社會主義已經勝利的國家及其哲學家，還有誰能夠幫助我們國外的朋友兄弟，用科學社會主義意識來照耀自己鬥爭的道路？除了我們還有誰能夠啓發他們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來武裝他們？

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文化，在我國正在強大發展起來，羣衆社會主義意識的不斷增長，向我們的思想戰線的工作日益提出更多的要求，對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正開展着全面的進攻。除了我們哲學家，還有誰能夠領導哲學戰線的工作者隊伍？還有誰能够在綜合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經驗時，在解決社會主義的新任務時，充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有了這些偉大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就應當問一問，我們哲學家是否能够負起這些新任務，在哲學的火藥庫中是否有足夠的火藥，哲學的力量是否削弱了，我們的哲學工作幹部是否能够用自己內部的力量來克服自己發展中的缺點，重新改造自己的工作？對於這個問題，決不能有兩種意見。哲學討論會表明了這種力量是存在的，這種力量是不小的，這種力量是能夠揭發自己錯誤以便來克服自己錯誤的。所需要的只是對於自己力量的更多的信心，在積極鬥爭中，在提出和解決現實迫切問題上更多的使用這些力量。應當改變工作中非戰鬥的速度，並應去掉衰頹的作風。從今以後，努力工作，要像馬克思、恩格斯、列甯那樣工作，像斯大林那樣工作（鼓掌）。

同志們！你們記得，恩格斯當馬克思主義書籍出版了兩三千份時，是如何高興，把他看作一

件有重大意義的巨大政治事變。從這個角度我們看來並不算很大的事件中，恩格斯作出了結論：說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已經在工人階級中深深生了根，那麼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深入到了我國人民各個廣泛階層的事實，會要怎樣說呢？如果他們知道我國哲學著作在民衆中散播了幾千萬份，他們又會怎麼說呢？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勝利，這是馬、恩、列、斯的偉大學說在我國成了全體人民學說的活生生的證明。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所沒有的這種基礎上，我們的哲學必然要發揚起來，我們的時代是列甯斯大林時代，是我國人民的時代，是我國人民成了勝利者的時代，我們要不愧爲這個時代的人！（熱烈的長期的鼓掌）

附

錄

論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

藍列波巨作

亞天貳譯

列甯和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原則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我們的黨不能容忍有絲毫的不穩定性與無原則性的表現，要求我們工作人員能經常不打折扣的完成自己的任務，經常站在政治活動家的崗位。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就是對一切稍微脫離黨的原則思想和政策的傾向之不可調和的精神，黨的政策是蘇維埃制度之生命的源泉，黨的工作者在自己一切大小工作中，應以黨的政策為行動指南，從政治的原則性的路線出發。

列甯教導我們說：政治是從聯繫到千百萬人民利益的事情出發，是原則地從政治上對待問題，就是說，要從千百萬人及他們之間相互關係的觀點來觀察問題，這就不能在本位主義的、地方性的、朋友關係等利益面前作絲毫的讓步。布爾什維克重視友情、同志關係，但是他認為評定一個人行為的最高標準，是看這個人如何對待由蘇維埃埃國家所代表的人民利益。

列甯寫道：「我們承認同志間的義務，承認有援助一切同志的義務，承認有耐心聽受同志意見的義務，但對我們來說，同志間的義務是從對俄國的和世界社會民主黨的義務產生出來的，不能把它顛倒過來。」（列甯全集二卷五四一——五四二頁）

由此可見，在原則性的精神上教育幹部，這就是說，必須作到在決定任何問題時，幹部不是

從私人的或地方的利益出發，而是從國家的利益出發，在一切場合堅持這種利益，並與反國家的傾向作鬥爭。每個工作人員底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表現在他對自己所擔負的工作之態度上，而檢查他的原則性，就看他是否把自己的工作服從於國家當地的重大政治任務，評定一切措施的標準，是這些措施是鞏固還是削弱我們的偉大事業，促進這件偉大事業的繼續發展還是妨礙其發展，這一點也應作為測量一切工作人員之布爾什維克原則性的標準。

現實在證明着，不善於正確判斷各種現象和不善於有原則地對待問題，會受到嚴重的損失，拿「星」及「列甯格勒」兩雜誌編輯部所犯的錯誤為例來說——這些錯誤被聯共中央及時的揭發了，這些雜誌的實質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星」和「列甯格勒」兩雜誌的領導工作人員，不是把正確的教導蘇聯人民和政治上指導文學工作者的活動的利益作為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而是以私人的朋友——就是說庸俗的利益為其對待文學工作者的關係之依據，由於他們不願意破裂朋友的關係，所以他們對沒有價值的、反藝術的、脫離政治的作品不作批評，由於他們害怕得罪朋友，便登載了非常不適當的作品，聯共中央的決議裏說道：「這種自由主義，把人民的利益與國家的利益正確的教育我們青年的利益作了朋友關係的犧牲品，它閉塞了批評，結果是作家們停止繼續深造，喪失他們對人民對國家與對黨的責任感，他們也就停止前進了」。或者我們再拿對外國阿諛逢迎的事實來看一看，很顯然，我們一部份落後的知識份子，還沒有擺脫掉這個可恥的毛病，一些黨的和經濟的領導者們，不用蘇聯民族自豪的精神來教育人們，却對媚外的奴顏婢膝事實諱安協，這還不是無原則性的表現嗎？這說明需要在一切問題上表現原則性，在黨的工作中尤其必要。從政治上處理問題的態度——是黨的工作中的基本態度，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黨的生活與黨的工作之基礎，不在於黨在當時所採取的或能够採用的那一些組織形式，而在於黨的政策與黨的對內和對外的政策。」（列甯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四一九頁）這就是說，

我們的工作人員應當不僅是好的組織者，熟練的實際工作者，而且也是政治上成熟思想上堅定的人。

深刻的思想，對馬列主義偉大思想之正確性的堅定的信念，便是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之基礎，只有在原則上堅定不移，很好的掌握了馬列主義思想的人，才能具有戰鬥的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才能從黨的原則立場上去對待問題。

馬列主義的理論給予幹部以光明的前途，使他們在工作中具有信心，這種理論發展他們的才能，使其能從小的事情看到大的事情，能從日常的眼前的工作中感覺到是在爲了偉大的理想而鬥爭；反之，對理論上不關心的態度，便會使其失掉前途。論到不關心心理論的人們時，斯大林同志說過，他們會從政治活動家變成爲政治上的庸人，變成無原則的脫離政治的專務主義者。

斯大林同志說：「關於這種游離不定的人們，偉大的俄國作家果戈里會頗中肯地講過：『那些沒有定見的人物，是既非此又非彼，反正你不能理解他們是些什麼人，簡直是非驢非馬。』」（列寧斯大林論黨的建設二卷六九零頁）

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乃是在思想上、原則性上教育我們幹部的的方法，同時也是提高他們戰鬥力的最重要方法，偉大馬列主義的思想，乃是我們幹部精神力量之活的源泉，是幹部之堅決性及其在克服困難中之不枯竭的精力之活的源泉，實際的經驗，在在都證明着思想開展的人們在實踐中也是有力量的，他們在工作中有更大的信心，暫時的失利不能使他們灰心，他們堅強地向既定的目標前進，正因爲如此，黨便要求我們的幹部有系統的努力地進行自我學習，以精通馬列主義的理論。

布爾什維克的原則性是一種對一切缺憾的不能容忍性，它是在高度嚴肅性的情況中養成的，關於以原則性的精神教育幹部，儘管高談闊論，但如果黨的委員會不表現足夠的嚴肅性，姑息地

對待工作人員的錯誤，那麼便會給布爾什維克的幹部教育招致嚴重的危害。比如在伏羅希洛夫格勒省黨委中就存在着這種實際情況，不久以前，國家計劃局的代表揭發了「克拉斯諾錫煤礦」托拉斯和「卡堂也夫煤礦」托拉斯兩企業中多報礦井中採煤量的事實，他將這些通知了聯共省黨委的領導同志，據估計將會加以處理，但省黨委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原則性，沒有注意兩企業中領導者違犯國家利益的行動，沒有使他們受到處分。

作一個有原則性的人，就是說不怕得罪任何人，而直爽地誠懇地指出他們的缺點，領導者應當善於「用布爾什維克所固有的那種全部直爽態度發表自己的意見，……」、「像布爾什維克那樣明白而公開……」（斯大林論列甯主義問題十一版三九八頁一四四頁）。同時，有原則性的人他本身也不怕勇敢的、坦白的、客觀的批評。

批評乃是布爾什維克幹部教育方法的靈魂，在對批評的態度上也可以檢驗一個工作人員底原則性，一個工作人員不能把布爾什維克的有益的批評看作是對自己的侮辱，看作是對自己的信心的損害，因而把自己看得高於工作的利益，他應當有勇氣批評別人，也善於勇敢地接受批評。

「任何一個組織沒有批評的話都會腐朽的，沒有批評則任何毛病可以深入骨髓難治療，只有大膽的公開的批評才能幫助人們變得日益完善，才能促起人們前進，克服工作中的缺點。凡是沒有批評的地方，那裏便從根上腐爛發霉（按係一種很小的細菌）停止不前，那裏便沒有可能前進」（日丹諾夫）。

可惜還有一些工作人員對批評的不能容忍態度，竟以報復所謂「欺侮者」相威脅，而有時竟然實際的威脅起來了，可舉這樣一件事實為例，黨員伊萬年科同志曾同其他一些同志正確批評了莫斯科卜庫爾斯克鐵路配車處的工作中的一些嚴重的缺點和該處處長斯米爾諾夫同志，斯米爾諾夫不去領聽批評與按照布爾什維克的號召改正工作中的嚴重缺點，反而把伊萬年科同志的工作

撤掉了，甚至當伊萬年科奉部令恢復了工作之後，斯米爾諾夫却硬降低了她的工作職位，按她的專門技能本是工程師，現在却要她當統計員，奇怪的是鐵路局黨組織的領導者們對此熟視無睹，事實上是助長了斯米爾諾夫同志的不正確的行動。

不能容許這樣一種用處理家務事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情況之存在，沒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解決問題，妨礙對缺點的揭發與糾正，對教育作為政治活動家的工作人員是有危害的。

缺乏原則性，沒有布爾什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有時會得到什麼結果呢？在庫爾省黨委的實例中可以看出得很明顯，該省黨委的前任書記沙拉波夫同志，以朋友關係代替了工作中的黨的原則性，省黨委中形成了一種一團和氣、泰然自若的風氣，黨的與蘇維埃的積極份子中間出現了無紀律性與放蕩散漫的份子，沙拉波夫同志自己不關心工作，竟有這樣的情形：當農村工作火熱的時候，他却去找自己的朋友和熟人遊逛去了，這樣得到了什麼結果呢？結果是該省許多區裏播種進行得不好，收割與繳納糧食的工作也準備得很不好，省黨委的委員們都知道這一切情形，但對省黨委領導者所養成的這種非布爾什維克的習性不進行反對，這樣便表明了他們是無原則性的人，是庸人，而非政治的活動家。

無原則性的工作人員，其結果往往是失掉獨立性與自動性，追求物質享受的工作人員把自己束縛起來，失掉了批評別人的可能性。庫爾省黨委的省委，有許多的關係上表現了無原則性，就因為他們中間有一些人按着沙拉波夫同志的提議幾度獲得了獎金，這也是他們彼此互相原諒錯誤的原因之一。

無原則性、庸俗化，也常常是不遵守布爾什維克原則挑選與分配幹部的結果。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要根據政治的標準來挑選幹部——就是說要看該工作人員在政治上是否是可靠的，也要根據業務的標準——就是說，看他是否適於這樣一種具體工作，凡是違反這些原則的地方，凡是

挑選幹部只根據家庭的、庸俗的、朋友的關係，不管他們政治上和業務上是否適當，那裏便要替吹拍逢迎與在工作中互相包庇缺點造成有利的條件，得到的不是在原則基礎上的領導核心，『不是負責的領導團，而是親近人們的小家庭，而是這樣一種組合：它的組員，都力求和平共居，彼此不相得罪，家醜不可外揚，互相吹噓。……』（斯大林）

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到對工作人員的高度嚴肅性。在烏梁諾夫斯克有很多事實表現出了嚴重的缺點，比如城市管理無人過問，居民們常常沒燈光，自來水忽有忽無，滿街是髒東西，省委書記德林吉也夫同志對此熟視無睹，對於城市管理失職的罪人表現了自由主義的態度，這一切正因為德林吉也夫以前曾在遠東工作，當時他便隨身把幾個對於他是『合適』的工作人員帶到烏梁諾夫斯克來，現在他對於這些人的工作也未表現出足夠的客觀態度，而因朋友關係，對他們就百般的原諒了。

對幹部進行思想教育，這是我們當前的重大任務，新的幹部不斷的增長起來，必須以布爾什維克的傳統教育他們，發展其優良的性格與品質，高度的原則性與理論性，乃是列甯——斯大林式的工作人員之卓越的特點與最重要的品質，以原則性與克服困難的堅決性教育幹部，將會更加順利的實現新五年計劃的任務，現在我們國家內建設共產主義的任務。（譯自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報）

論對缺點的不調和性及布爾什維

克的嚴肅性

斯列波夫作 蘇 瑛譯

共產黨是反對停滯不進及保守主義的死敵，從來不滿足於已獲得的成績，而總是向前看。從我黨的本質及其革命的精神中，產生了對缺點的布爾什維克的不調和性。『對本身缺點無情的揭露，是一切生動活潑的政黨所必需的，沒有比自滿的樂天主義再壞的事了。』（列甯全集七卷三百零五頁）

驕傲自負、泰然自若，和布爾什維克黨人沒有因緣。列甯和斯大林責備這樣一些工作人員，對他們來說，只要有某些成績就足以使他們苟安自滿，而忘記缺點。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這部份人說：『只要有兩三個大的成績，就已目空一切，要再有兩三個大的成績，就驕傲起來，百事不在乎了。』

對缺點，表現布爾什維克的不能容忍態度，這就是說，不因勝利而衝昏頭腦，不因即使是很小的誘惑而鬆懈工作，清楚地看見尚未解決的問題，要正視錯誤。

大家知道：如果不讓缺點發展下去，那它是比較容易改掉的。錯誤經常是從很小開始，可是當它不被人所注意的時候，它就發展成大的錯誤。『所有的人都可能害癩，但如果這個癩開始腐爛時，就可能變成不治之病。』（列甯全集第二十六卷九十九頁）我們應該培養自己最寶貴的物品

實——當缺點剛一發生的時候，就要善於看出、揭穿，並預防它。因此，有些個別的工作人員害怕對自己不如意而杜撰各種辯詞來掩蓋，或者逃避缺點，以「故作清白」，這就是不可容忍的事。布爾什維克的黨不能以個人利益或暫時利益的觀點，去對待人或事物；而應該永遠站在國家利益之上，客觀的估計工作中的優點和缺點。

不隱瞞缺點——這是對領導者不變的要求，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而重要的是：善於誠心誠意地揭發產生缺點的根源，及找到糾正缺點的方法。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不能夠逃避責任，不能在困難面前低頭，並且他必須儘其全力來克服它。假如工作人員只知道困難悲嘆，而不真正的困難作鬥爭，那有什麼用處呢？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表現在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上；如不公開批評並分析缺點，那怎麼叫做揭發缺點呢？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黨所掌握的真正動力和強大武器。

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是揭露和糾正領導方面錯誤的方法，我們需要自我批評，像需要空氣和水一樣。斯大林同志說：「我認為沒有自我批評，我們黨就不能前進，就不能揭發我們的瘡的，就不能消滅我們的缺點。」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這就是說，領導者應該是在工作中很嚴肅，不是馬馬虎虎，不是從家庭親友方式決定問題，而是有高度的嚴肅性。這才能即時揭發缺點，找到糾正缺點的途徑，正確地教育幹部。

真正的嚴肅精神，不容因「職務」和「功勳」而有所遷就，它應該同樣的適用於好的和不好工作人員。可惜並不經常是這樣的，有人常常認為這種嚴肅精神只拿去對待不好的工作人員，把它看成是領導者手中的特種鞭子，為應付懶惰的人使用的。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它有害於工作及幹部教育。拿這樣的事實作例吧：就是從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薩拉多夫省「新布拉斯」機器

拖拉機站，在很長時間中，都認爲是先進的站；該站一切工作都作得挺好，它底領導受到無限讚揚。但沒有指出他們工作中的缺點，因此阿赤金同志也覺得自己真正是十全十美的人了，而自滿自足起來了。到收割莊稼的時候，他說道：「我們沒有什麼可着急的，反正我們會先收割完。」這樣鬆懈的結果，使得該站很遲的才開始收割運動。而結果怎樣呢？結果，阿赤金同志所領導的機器拖拉機站，在收割方面落後了，並拖延了被它供給拖拉機的集體農場的收割。

就是很好的工作人員，也不保險不犯錯誤，沒有缺點。要是缺乏這種嚴肅性，就是好的工作人員對待自己工作，也沒有批評的精神了。布爾什維克的嚴肅性，就是說要根據人民工作的效果來審查他們。這種審查，不是根據某種片斷的「突擊」工作；而是根據經常的工作，不斷的對執行指令指示加以監督，能培養工作人員的準確性及嚴肅性。不管你說了多少關於紀律的必要及好處，而作出的決議很快就被忘記的話，那就會廢弛紀律，發生散漫，結果責任心就一定喪失。

要有嚴肅性，這就是說，要這樣的組織領導，使得任何破壞黨的指令的行爲不能不受到底追究。在這一方面起着很大作用的不僅是自上而下的審查，單單這樣，還不够；斯大林曾指示，自下而上進行審查的重要性，即被領導者審查領導者，揭發他們底錯誤，指出糾正這些錯誤的辦法；黨員羣衆在積極份子會議上、在代表會議上來審查自己底領導者的方法，就是聽取他們總結報告，批評他們的缺點，選舉或不選舉他們到領導機關去；沒有這樣的審查，就不能夠用對錯誤和缺點的不調和精神來正確地教育幹部。

工作中的嚴肅性和官僚管理——粗暴的負責，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官僚管理是一種無知的產物，是缺乏領導的結果；不會研究事物的本質，沒有正確的配備幹部，企圖個人獨斷一切，不吸收黨事的人參加，不研究羣衆的經驗，不考慮黨工作人員集體的意見的地方，就有這樣的現象。

官僚管理，就是說，命令和領導不依靠積極份子。而領導上的任務，恰在團結積極份子，需要組織各種不同部門工作人員的配合行動，以便「推進工作，不是各自為政，各幹各的，而是應該組織起來，團結起來，因而獲得成功的最大保證。」（日丹諾夫語）

伴隨官僚管理而來的，照例是時常調換幹部。殊不知處理幹部的組織工作本身，就包含有教育的成份。好的領導首先是教育和訓練幹部，並給他們以實際的幫助。當然，處罰也有其教育意義，但要是濫用處罰，就不成其為教育的方法，因為幹部會對處罰不在乎了。

也有這樣的情況：需要堅決的處置時，而領導上却去進行勸說；看到工作人員有濫職時，領導者却猶豫不決，以自由主義的態度代替了處罰。

就拿×××烏得幕爾特省委的事實作例子：在這裏，沒有對待工作人員的嚴肅性；巴依葉爾領導的建築設計托拉斯，他本人行為不正、欺瞞上級，而省委不去揭露這種工作人員，因而包庇他、掩護他去損害我們事業。而且這樣的事實，不是別的現象，這不是鞏固紀律，而是使幹部教育受到嚴重的損失。

正確的教育幹部，並不是用私人朋友關係來團結他們，掩護他們的缺點，姑息他們的自尊心。黨的工作人員應該對自己有一基本的訓誡——不要姑息個別的人員，不管他們有多麼高的職位，只是要尊重事業，尊重事業的利益。斯大林同志是這樣教導我們的。

在某些個別的情況下，領導工作者害怕別人責備他為官僚管理，不敢嚴格的要求執行黨的指令，責難嚴肅性是多餘的。這只可能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只愛輕鬆的生活，並在取得第一個成功之後，就仰首天外，自滿自慰。假如一個領導者，他是為事業的利益而行動，他努力工作，他可以要求別人和他一樣。那麼這種嚴肅性，對他有什麼不好呢？

對缺點的嚴肅性及不調和性，只有那些真正不受官僚習氣的領導人才有可能的。在工作中沒

有原則性，對自己行動不約束的工作人員，就使自己同那些阿諛奉承、不正派的人同流合污了。這樣的工作人員，在同缺點和罪過作鬥爭中，表現了束手無策，這裏相互包庇及溫情主義的風氣，就代替了原則性和嚴肅性。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像溫情主義及互相包庇這種非布爾什維克的習氣，會發生多大的害處，最後，這些東西必致引向相互原諒錯誤。他說：「譬如說，某個組織的高級領導者張三犯了很大的錯誤，並且把事情搞壞了，但是李四不願批評他，不願揭露和糾正他的錯誤；不願批評是因為不願意『給自己樹立敵人』，犯了錯誤壞了事情，這有什麼要緊，我們大家誰不犯錯誤呢？今天我們原諒了他——張三，明天他就能原諒我——李四，因為怎麼能保險我不犯錯誤呢？大家客客氣氣和平相處多好呢；讓錯誤放過去，這就損害了我們的偉大事業麼？沒有什麼，反正對付過去就行。同志，這是我們某些負責同志常有的議論，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什維克是批評整個世界的人，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是翻天覆地的人；假如我們爲了使某些同志不麻煩而放棄自我批評，這除了傾覆我們偉大事業而外，就不會有另外的結果，難道這還不明顯麼？」

什麼地方家庭式的解決問題佔了上風，那裏就沒有嚴肅性，那裏就容忍缺點和錯誤，甚至常常容忍罪過。

我們舉這樣一個例子吧：不久前，吉爾吉斯聯盟共和國的國家檢查機關在檢查該共和國農業供給處的工作時，發現了亂分配貨物，私自供給，違反財政紀律的事實；而該供給處把所規定對於機器拖拉機站、修理工廠、作坊、集體農莊、供給機器及機器零件的工作做得很不好。吉爾吉斯共和國農業部的領導人明知供給處工作做得很不好，而且自由主義地對待他底某些工作人員，沒有指出他們這種活動的重大損害，沒有表現必須的嚴肅性。如果問，這是爲什麼呢？就是因爲該農業部的領導者本身，有時也參加了這種非法的行爲；他們不按規定，比如把配給機器拖拉機

站、農業技術學校及普通學校的很大數量的布疋浪費了，而且把一部份分給農業部及供給處的工人員了，還分了其他的物品。

由於這些緣故，該部的領導者在某種程度上，就和下級供給處的工作人員有了牽扯，而在他們工作中的嚴重缺點鬥爭中，就失去了武器。這一點，說明了同自己領導下的人員的互相關係中，領導者思想上的純潔是如何的重要啊！

黨的工作人員，是給各個工作部門的幹部在工作上指示方向的。斯大林同志關於蘇維埃的黨的監察人員說過的話，對於黨的工作人員比對任何其他的人員更為重要。斯大林同志說：「他們應該純潔無瑕，追求真理，以求他們不僅能夠有形式上的權威，而且要有思想上的權威來審查和教育別人。」

思想教育，是教育幹部在工作中的嚴肅性，反對缺點之不調和性的最重要條件。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能夠深刻了解黨的政策，而因此提高每個工作人員的責任心，和對國家職務的感覺。只有自覺的和思想會受鍛鍊的人，才能明白自己對黨的義務，自己對黨所負的責任。

對缺點的不調和性，高度的嚴肅性，過去會是，現在也還是正確教育幹部的基礎。

（譯自四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真理報）

與群眾連系是黨的領導者最重要 的品質

A 葛萊普涅夫作 齊生譯

布爾什維克黨的偉大創立者與領袖——列甯和斯大林，總極度重視黨與羣衆的連系，總關心這種連系的擴大與鞏固。我們的黨是不能同人民分離的。黨是被許多堅固的不可破裂的鑄鎖同千百萬勞動者連系着，而它的力量，它的不可戰勝性就在這裏。斯大林同志說：「布爾什維克的所以強有力，就是因為他們與自己那生育、撫養和教育了他們的母親即羣衆保持着連系。而只要他們同自己的母親即人民保持着連系，則他們就有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戰勝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之所以是不可戰勝的，其關鍵就在這裏。」

我們的黨全部歷史說明着布爾什維克是善於組織成百萬的羣衆，善於團結羣衆，與他們打成一片，並使他們跟隨自己。在祖國戰爭的日子裏，「黨同人民是更加親密了；同廣大的勞動羣衆的連系是更加密切了。」（斯大林）

布爾什維克黨在人民羣衆中間享有巨大的愛，無限的威信與信任，因為勞動人民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深信黨的政策之正確，深信布爾什維克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沒有其他的利益，除了爲勞動人民的幸福而鬥爭的崇高目的以外，沒有其他的目的。在我們國內，兩種偉大的力量——人民與共產主義已合而爲一。蘇維埃社會制度正把蘇維埃人民結合成一個總的集體，創造着一種黨

與人民之間完全的相互信任與相互了解的氛圍。

黨會號召勞動者加速恢復與發展工業，於是工人階級就以提前完成工業計劃迎接偉大十月之三十週年的有力競賽來回答這個號召。黨會號召蘇維埃農民為最快的提高農業，為使國內糧食豐裕而鬥爭，於是集體農民對這一號召就回答以為高額收穫的羣衆進軍。

激發羣衆的這種勞動熱情，引導這種熱情去完成經濟與文化建設的具體任務——黨組織的主要責任就是如此。

領導的藝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領導——這並不是說坐在辦公室裏寫作指示。領導——這是說推動廣大階層的人們，帶領他們去勝利地完成黨所規定的任務。同羣衆，同人民的經常的連系，不僅善於教育羣衆，而且善於向羣衆學習——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基礎。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為了正確的領導，只是領導者們的一種經驗是不夠的，這種經驗是不充分的。為了正確的處理事情，領導者應該以羣衆的經驗，以普通黨員的經驗，以勞動者的經驗來補足自己。

在一九三七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三月全會上，斯大林同志曾舉例說明，中央委員會如何珍貴普通人們的經驗，如何注意傾聽他們的建議。在提起全會參加者注意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與蘇聯人民委員會關於提高頓巴斯煤的產量的決議後，斯大林同志說：「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的這個決議——它已為我們全體同志所承認為正確的而且甚至是著名的決議——是由下層的普通人們給我們提示的。」

黨的領導者——州委的、市委的、區委的、基層黨組織的書記——如果他願意實際地布爾什維克地指導事情，他就應該經常傾聽普通工作人員的意見，同他們說話，考慮他們大量的實際經驗。

下述事實也說明這一點是有着如何決定性的重擊。有一個普通黨員斯塔哈諾夫運動者馬特洛索夫，他是「巴黎公社」工廠的切皮工人，他曾提議製訂普及斯塔哈諾夫勞動方法的計劃，以便在一定時期內全體工人無例外地完成並超過生產定額。工廠的黨組織支持馬特洛索夫同志的創議。莫斯科黨委會通過了關於普及靴匠的經驗到其他工業部門的決議。於是一個在目前普遍全國的爲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新的羣衆運動開始了。

這就是爲什麼要傾軋普通工作人員的意見，隨時大力支持他們的主動創議的道理。

斯大林同志又教導說，組織決議的執行，乃是正確領導的最重要的條件。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沒有羣衆的直接幫助是不可能的。組織決議的執行實際上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把決議的思想與意義變成勞動者的意識，推動他們去勝利地完成這個決議，保證一切政策中黨員的先鋒作用，發展羣衆中的組織的與政治的工作，展開競賽與先進經驗的宣傳。沒有羣衆的幫助，連組織決議的檢查，同樣也是不可能的。

布爾什維克黨把自己對羣衆的領導，建立在完全的相互信任與相互了解的基礎上，布爾什維主義與行政命令是水火不相容的。黨始終堅決地與黨員傲慢自大的各種表現，簡單的行政命令，辦公室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作鬥爭。在這一點上，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月全會的決議是一個嚴重的警告。決議說：「不能容忍這樣的一些缺點，如像：以行政命令集體農場主席的經常更換，集體農場內部民主的破壞等，來代替集體農場中不屈不撓的系統的組織工作和幹部教育。」全會要求黨的一切組織更加鞏固同羣衆的連系。

遺憾的是，我們還有這樣的一些領導者，他們藉自己的職位作威作福，高傲自大，脫離羣衆，不傾聽普通黨員、工人、集體農民們的意見。當然，在這些領導者那裏，事情是不能推向前進的。

什科達同志担任着奧姆斯克州卡拉泰斯克區的黨委書記。他一直迷戀於行政命令，以致他不僅脫離了非黨的積極份子，而且也脫離了共產黨員。什科達同志來到集體農場，來到機器拖拉機站——他不去同領導者們，同普通的工作人員談論，不傾聽他們的意見。他大吵大鬧，而不管事情真相怎樣，他又到別處去了。這種方法能達到什麼結果，是不難想像的。結果是不僅普通黨員們，就是黨組織的書記，都極力避免到區委書記那裏去。區內黨的政治工作是異常的薄弱，該區的經濟工作在州內也是最落後的。

布爾什維主義的領導者，應該同羣衆有經常的交往與接觸，在其一切活動中憑藉他們。然而布爾什維克同羣衆的接觸從來不能意味着尾巴主義。相反地，尾巴主義，同行政命令一樣，與布爾什維主義的精神與政策毫不相干。

有時會有這樣的事：黨組織的領導者表面上似乎同羣衆是有連系的，他常在工人與集體農民中間。可是你一往深處看——就發現這位黨的領導者並不在探究事情的實際，他在同人們的談話中逃避談論尖銳的問題。

當然，布爾什維克不需要這樣的「連系」。真正的領導者並不做羣衆的尾巴，而是領導他們跟着自己。他首先忠實於同羣衆的關係。他不怕尖銳地提出問題，只要這問題照黨的觀點是正確的。如果工人或者集體農民工作很壞，沒有完成規定，領導者的責任就在於改正他，率直地同他談話，而如果需要時——就由大家來批評他。這只會帶來益處。領導者的壞的工作，被領導者的壞的工作，都需要批評。

黨將其同人民連系，建立在以列甯、斯大林的偉大思想的精神深刻教育羣衆的基礎上。說服的方法，是黨的政治工作中基本的與主要的方法。這就是黨之所以要養成每個黨員進行鼓動與宣傳，向羣衆解釋黨的政策與決定之意義。領導者必須以身作則。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三月全會

指示，「區的、州的、邊疆的和共和國的黨與蘇維埃的機關負責領導的工作人員，必須到集體農場中去，親自指導政治的與黨組織的工作，指導集體農場的座談會與會議，在黨的基層組織中解決黨的與政治的工作。」

可是，並不是各地都在執行這個極端重要的指示。在布利安斯克州，許多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逃避做集體農場的政治工作。他們中有些人還算是講演團中的人，可是，他們就連自己這個責任也不去盡，州蘇維埃執委會副主席格列賓尼可夫同志終年不在集體農場做一次報告。

四月和五月間他是在齊里亞廷斯克與維萬尼奇斯克區，但是他沒有一次向集體農民講話。他說：「沒有時間做報告，應該播種了。」

黨的、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應該利用一切同勞動者連系的形式。在這裏親自與人們接觸，是有巨大的意義的。這種接觸常常能很好地使人說出心裏話，無懼地確定羣衆的情緒，立即解答羣衆的詢問，並在政治上教育他。那些極力躲開勞動者的官僚習氣的領導者，是值得最尖銳的譴責的。而另一些工場的管理人或蘇維埃組織的領導者，普通的人簡直難以會見他們。不能容忍類似的這類非布爾什維克的實際。

黨的組織，應該儘可能地好好利用羣衆組織的機關——勞動者代表蘇維埃，職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等等，以鞏固同羣衆的連系，以改善對他們的領導。企圖僅僅依靠黨組織的力量，黨員的力量來做一切，而不吸引非黨的積極份子參加工作的那種黨的領導者，是不好的。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藝術在於勞動者的一切羣衆組織的活動中，組織配合行動與連系，領導他們，去完成這些或那些任務。

黨的組織應該經常關心改善地方蘇維埃的、職工會的、共產青年團組織的工作，必須用一切方法鞏固它們，以對選民、對人民、對廣大勞動羣衆負責的精神教育它們的工作人員。

同羣衆連系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報紙。它使黨能够每日每時地去同羣衆談話，把黨的思想與政策變爲成百萬羣衆的財產。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之責任，就是積極地參加報紙工作。可惜很多地方工作人員很大這樣做。

同人民密切的經常的連系，善於不僅教育羣衆，而且向羣衆學習，善於領導羣衆並傾聽他們的意見——黨的領導者之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如此，正確的布爾什維克之領導的條件，就是如此。每一個黨組織的，黨委員會的領導者，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嚴格地遵守這個列甯、斯大林的指示，做羣衆的真正領袖。我們一切勝利的基礎，就在這裏。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真理報專論）

論忠誠與老實

斯列波夫作 齊生譯

忠誠老實——這是列甯、斯大林型的工作人員之確定不移的特點。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黨的與蘇維埃的幹部，要像列甯那樣忠誠與老實。布爾什維克在其工作與生活中的每一舉措，均需培植與發展這種優良的品質。

要忠誠——這就是說，「要像依里奇經常作的那樣，像每一個布爾什維克都應該作的那樣，將全部真情率直而老實地向黨坦白出來。」（斯大林）

黨對每個布爾什維克所要求的忠誠與老實，是在實際工作中來檢驗的。一個共產黨員，不論其所處何種職位，他都應該有勇氣批判地估價自己的活動，說出自己活動的真情。在政治上的忠實，完全要由「言行一致」（列甯）來檢驗。由此就產生了一個最重要的布爾什維克的原則——不是按照人們的言詞、諾言、報告來評判人，而是按照人們的行為來評判人。

布爾什維克的話——是固定不移的話，領導者、公務人員是不能隨便說話的，話既說出，那就要表現決心毅力，並執行自己的諾言。如果你因為什麼原故盤算錯了，力不能勝——那你就老老實實說出這一點，否則你就是以噁舌者或騙子的可恥角色來說話。

列甯說：「當一個人言行不一致時，這就完全糟了，這會導向偽善。」

自然，當說到以忠誠的精神來教育幹部的時候，這就不僅是指這個字在普通意義上的忠實，而且也是指善子在每一件、即令是最小的事情上，從整個國家的利益，從黨的利益出發，而不是

從地方的，尤其不是從純粹私人的利益出發。

布爾什維克黨——蘇維埃人民的先鋒隊，蘇維埃人民偉大創造性的勞動之領導者——是以國家的全民的利益之深刻意識的精神來教育全體勞動者的，這尤其指的是負責領導的幹部。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與實際證明，我們的幹部是如何深刻地了解整個國家的利益，他們如何不可調和地對待各種反國家利益的現象，這在蘇維埃羣衆完成着的成千愛國事件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出。

同時也有這樣的情形，即是某些工作人員將國家的利益置於腦後，爲了取得獎賞，或隱瞞缺點，這樣的工作人員，就粉飾真情實況，走上了哄騙國家，欺詐和捏造的邪路，而故意地提出不合實情的關於執行國家計劃的報告。

例如，伊凡諾夫負責的建設局的領導者們，在好幾年中提出的關於建設情形的報告，都是假的，按照這些報告，有一百三十件計劃「卓越地」和「很好地」建設好了，其實其中六十五件是不完全的和不適於經營的。爲了這些誇張的成績，建設局在兩年過程中得到了兩百萬盧布的獎金，其中伊凡諾夫個人就得到了十萬零三千盧布。奧姆斯克州黨委會和中央建設局的領導者們，沒有即時注意這些欺詐和捏造，而是很久以後才把它們揭發出來。

雖然類似的情況爲數不多，黨的組織仍不能無視這些情況。專業的利益和幹部的教育，要求黨的組織不能無視任何一件非法的事，而是有責任給牠們以反擊，以忠誠的老實的對待國家利益的態度，來教育工作人員。

無須證明，及時揭露的缺點是較易消除的。當人們不及時地講出真情，隱藏缺點，而最後使工作中的失敗暴露出來的時候——那時要糾正形勢就非常困難了。由此可見，工作人員是應該有勇氣講出真情，不粉飾現實，指出事情的實際狀況，及時地揭露缺點，並指出其根源。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不應該將地方的利益提得過高，而應該如實地反映本區的企業的集體農場的情

况。我們每個工作人員的本份，不要將被曲解了的個人威信高於一切。

對國家的不老實，常常表現在不願意肩負緊張的但是完全可能完成的計劃，表現在企圖以各種藉口逃避計劃的執行，表現極力想得到其實沒有也可以的國家的補充資料。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無須外界之督促，也無須訴苦，就儘力超過完成國家所予的任務，去尋求新的儲藏，俾使其熔於總的國家洪爐中，一心為國家的人民的利益服務。

來自上級的最詳細的計劃及正確的指示，是不能夠預先估計到當地所有的全部可能性的。如果在工作過程中，發現了新的儲藏，布爾什維克不能也不應該將牠們隱藏起來，他對誰隱藏牠們呢？對自己的政府嗎？對自己的黨嗎？隱藏儲藏只能是這樣一些人的事，這些人將其衙門的鐘樓看得高過國家的、黨的利益。

這些允許自己對國家耍狡猾的人們，是容易屈服於落後的傾向的。他們對橫在我們路上的困難，時刻準備加以誇大，又常常沒有表現勇氣與決心的魄力，希望不負責，把自己的責任推給別人——這是對完成國家義務的不老實態度的表現之一。害怕負責，並按照「可不要出了什麼岔子」的原則去作事的胆怯鬼，是沒有能力將事情推向前進，改善它，並表現創造性與主動性的。

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教育幹部，這就是要以工作人員自己的錯誤與缺點來教育他們。這是斯大林對布爾什維克幹部教育的珍言之一。

斯大林教導說：

「布爾什維克的責任，就是不掩蓋自己的錯誤，不逃避有關自己錯誤的問題（像我們常常發生的那樣），而是老實而公開地承認自己的錯誤，老實而公開地謀求糾正這些錯誤的方法，老實而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

有這樣的事實，某些工作人員逃避承認自己的錯誤，以為承認錯誤有傷工作人員的名譽，會

有損其威信。這是對威信的不正確而虛偽的了解，實際上，承認自己的錯誤，準備糾正錯誤，是不會損傷工作人員的威信，反而會提高其威信的。必須記住列甫的金玉之言：「聰明的不是那些不犯錯誤的人，而是那些犯了錯誤而不很嚴重並善於敏捷而迅速地糾正錯誤的人。」

費力克斯·特捷仁斯基說：

「會失去聲望的，只是那種隱蔽自己的缺點，不願意同醜惡鬥爭的人。也就是那種本應失去聲望的人。必須學會正視真理，並從羣衆及一切參加生產的人們那裏，去把握真理，再沒有什麼比自吹自擂與自滿更壞的了。只有當你一步一步地搜索醜惡，並征服它的時候，你才能够前進。」

批評與自我批評，乃是在精神上教育幹部忠誠與老實的最重要的方法。用平常的格言「家醜不可外揚」進行領導，是不可能的。

在黨選擇幹部的原則遭受破壞的地方，是最容易發生這種類似的非布爾什維克的風習。誰接受了不許可的選擇幹部的的方法，誰就造成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負責工作人員的領導集體被排斥了，而代替它的，却是盡力和平共處而不相互批評的親人小家族行幫。在這種土壤上，就繁殖着庸俗的劣根性，而有時就產生對國家利益的誠實態度。

批評與自我批評，可以使缺點適時的揭發出來。錯誤如不隨時予以糾正，即會滋生新的錯誤，並最後毀滅工作人員，下面就是一個可作教訓的例子。

安德列夫同志，最近四年間在薩拉托夫城市蘇維埃執委會擔任第一副主席。還在他擔任這一工作的開始，他就犯了一系列嚴重的錯誤，黨的市委會與州委會接到了很多對安德列夫同志行爲的控訴，但是他們並沒有及時向他指出錯誤，他自高自大，而且自詡爲沒有錯誤的。安德列夫濫用職權，蔑視蘇維埃其他委員的權力，擅自取消區蘇維埃的決定，並脫離羣衆。在一次州委會的集會上，他聲明說：我有很多比接見勞動者更嚴重的事情，我沒有時間傾聽控訴。

雖然這一切對於安得列夫都是可以避免的，他却終於被撤職了。如果人們及時地向安得列夫指出錯誤，而不是由於朋友的關係掩蓋了這些錯誤，那麼可能他還會作爲一個工作人員而被保留。

假如遷就幹部的自尊心，認爲這對於他們就是做了有益的事，是不對的，沒有比這種觀點更錯誤的了。以掩蓋幹部的錯誤來憐惜和保存幹部，等於實實在在地毀滅這些幹部。勇敢的徹底的及客觀的批評——這是教育幹部的基本方法。這種批評，會幫助成全幹部，刺激前進，克服困難。

基洛夫說：

「我們的布爾什維克的實踐，從來沒有過於平穩的關係。我們是會激怒人的……我們中間誰要是以這種或那種考慮，認爲算了，說了不好，我還是最好不說，不去批評，那誰就要成爲罪人。應該老實實地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方法，直視同志的、共產黨員的眼睛，向他說：「你親愛的人，你被絆倒了，纏住了，如果你自己不能起來，我就來幫助你，如果拉着手也不能拉起你，我就來拉你的頭髮，我要盡一切可能糾正你；但如果你親愛的人不糾正過來，那麼你就責罵你自己吧，你得滾到旁邊去。」」

以忠誠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沒有日常的嚴格的監督，沒有執行的檢查，是不可能的。黨的組織同工作人員的關係，不能建立在盲目的信任上。黨的領導和監督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認出工作中的缺點，很快地提出方法糾正。如對執行沒有完善而熟練地有組織的檢查，就不可能保證適時地揭發缺點，以忠誠與老實的精神，以布爾什維克對所負責任之責任心的精神，教育工作人員。如果工作人員知道監督是實實在在的，誰也不能將破壞指示的事馬虎混過而不爲人所知——那麼僅此即足以使他緊張起來。

爲了勝利地完成戰後五年計劃的任務，黨的組織在工作上就更嚴格，就更要培養工作人員那種對國家、對人民的崇高的責任感。對於一個布爾什維克，國家的全民的利益，是高於一切的。布爾什維克的天職，就是隨時隨地小心地保護自己的榮譽與美德，因爲這是列甯、斯大林的偉大政黨的榮譽與美德。在全體蘇維埃人民的眼睛中，一個黨員應該在一切事情上是先進的人，其德性引起普遍的崇敬與倣效之心的人。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真理報專論）

正誤表

本書係根據華北新華書店本年一月初版本翻印，卷末另加附錄四篇。本書付印後，又收到與原文校對過的校正本一冊，茲特將初版本中的錯字列表改正如後。

山東新華書店編輯部

頁 行 誤

正

三 六 經過審查

經過審查，

一五 (『顯然』至『歷史過程』一句，應另行排)

八 八 實際上

可是實際上

一一 二 代表、作

代表作

一二 五 抽象的

抽象的、

一四 一〇 農業。

農業。』

一七 七 (引用句的應低四字起排)

一七 八 (『當他』起一句應另行排)

一五 一五 計算出了

『計算出了』

蘇聯哲學問題

著者 日 丹 諾 夫

譯者 立 三

出版者 山東新華書店總店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出版

10
601070
27

601070